

# 东吴的基本国策与孙权的战争谋略

简修炜 庄辉明

汉末三国时期政局多变和烽烟四起的社会条件,造就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雄据北方的曹操、蜀汉名相诸葛亮、东吴统帅周瑜等人,固然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在剧烈的政治军事角逐的急流中,能统治江东达半个世纪的吴主孙权,亦堪称三国时代的俊杰。孙权在政治风云变幻中,能审时度势,坚持既定的国策方针;在云诡波谲的军事斗争中善于运用战争谋略,筹划有方,表现出高超的战争艺术。长期以来,东吴的基本国策多遭贬斥,孙权的军事才干及谋略则被忽视,史家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试对东吴的基本国策和孙权的战争谋略作一评析,以就正于方家。

汉末以后,各地军阀势力的割据混战,打破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统局面,战争成了经常发生的社会现象,也成为当时政治的主要手段。战争不仅是交战各方经济力、军事力的较量,也是各方政治力的较量。处于对抗中的任何一方,为要在频繁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首要之务在于制订正确的国策,确立一个切合实际的战略目标,用以指导和制约自己的一切军事行动。可以说,谁的战略思想正确,谁就能在对抗和冲突中占有优势,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孙权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东吴之得以割据江东,莫基于孙策;东吴基本国策和战略目标的确定,也肇始于孙策。从孙策在建安五年遇刺临终前对其弟孙权等人的嘱托,可以看出他是希望以“保江东”、“观成败”作为孙吴立国的基本国策的。孙权继立以后,确实不负其兄之厚望,正式确立了“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sup>①</sup>的基本国策,五十年中始终奉为圭臬而未曾稍改。

对于东吴的这一基本国策,历来存在着非议。宋代的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针对鲁肃与孙权“合榻对饮”时提出“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的建议评论说:“江东君臣上下,本谋不过此耳”<sup>②</sup>。其不以为然之意,溢于言表。近年来,亦有学者撰文认为:“在三国中,吴的内外政策最为缺乏远见”<sup>③</sup>。

要对东吴“保守江东”的基本国策作出恰如其分的评判,既要联系当时东吴所处的内外环境,更要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加以考察。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孙权所确立的基本国策,既是审时度势的务实之举,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明智决策。

从当时的外部环境看,东吴在鼎立的三国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王夫之论曰:“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sup>④</sup>。这是从政治凭藉与实力对比两方面指出了东吴的劣势。事实确是如此。曹操父子“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汉献帝的名义号令天

①② 《资治通鉴》卷 63。

③ 参见冯君实:《简论鲁肃》,《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

④ 《读通鉴论》卷 10。

下,虽然“操非果忠于主者,而名义所在,昭然系天下之从违,固不敢犯也”<sup>①</sup>。加之曹魏兵众土广,所谓“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sup>②</sup>,其势远在吴、蜀之上。蜀汉虽偏处一隅,地狭民少,势单力薄,但从宗法正统观念看,蜀主刘备以“帝室之胄”自居,树起“攘除奸凶,兴复汉室”<sup>③</sup>的旗帜,在政治凭藉上显然也较东吴为优。相比之下,据有江东的孙权,北有曹魏之患,西有蜀汉掣肘,既无蜀汉宗法正统的旗帜,更乏曹魏那样的军事实力,唯一可以凭藉而“拒操者,长江也”<sup>④</sup>。以东吴之实力断然无法与曹魏争雄;即使结好于蜀汉,形成犄角相援之势,也只是使南北间的力量对比大体平衡,仍不足以扫灭曹魏。由此看来,孙权之所以确立“保有江东”的基本国策,是从当时天下大势及各方政治、军事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审时度势而作出的务实之举。

如果我们再从区域经济发展和东吴政权社会基础的角度作进一步的分析,更可以明瞭东吴确立“保有江东”国策的历史必然性。

东吴“保有江东”这一基本国策和战略目标的的确立,是东汉以来区域性经济有所发展的必然产物。

秦朝及西汉时期,全国的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均在西北的关中地区,江南的经济还未走出低谷状态。直到汉武帝平定闽越时,淮南王刘安犹曰:“得其地,不可郡县也。”<sup>⑤</sup>司马迁也认为:“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蠃蛤”<sup>⑥</sup>。很明显,从生产发展水平的总体看,无论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土地利用、人口增长率,南方都落后于北方。但自东汉以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长江流域的经济得到初步发展,长江的上、中、下游,分别形成了益州、荆州和扬州三大经济区。

但是,长江流域经济的初步发展,并没有打破中原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占优势的格局,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南方落后于北方的状况也

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是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三国后期依然由北方来实现全国统一。然而,恰恰是长江流域经济这种一定程度的发展,在东汉末年长期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原经济的特殊条件下,形成了南北经济实力相对平衡的局面,导致了魏、蜀、吴三国的鼎峙,也成为东吴确立“保有江东”国策的经济基础。三国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体的被打破,出现了权力相对分散而形成权力的多中心和政治的多中心,在某种意义上是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曾明确指出孙权不得不“限江自保”的缘故:“今议者咸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sup>⑦</sup>胡三省也认为:孙权之所以“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争天下之心”,其因盖在于“自量其国力,不足以毙魏”<sup>⑧</sup>。这种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当然,孙权君臣也曾有过“全据长江”、进图北方的设想,但是从经济实力看,孙权连长江流域都未能全部控制,何以能与控制整个黄河流域的曹魏相对抗呢?再从政治力看,也无号召天下的旗帜,军事实力更明显不如曹魏。总观这三种力量的对比来看,孙权“自量吴国之兵力不足北向以争中原”<sup>⑨</sup>,只有力图凭藉长江天险以“保有江东”。

再从东吴政权的社会基础看,孙氏在江东得以站稳脚跟,与得到江东土著大族地主

① 《读通鉴论》卷 9。

② 《资治通鉴》卷 69。

③ 《资治通鉴》卷 70。

④ 《三国志》卷 54《周瑜传》。

⑤ 《汉书》卷 64《严助传》。

⑥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⑦ 《资治通鉴》卷 71。

⑧ 《资治通鉴》卷 72。

⑨ 《资治通鉴》卷 68。

的支持是密切相关的。东汉末年,江东大族地主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得到发展、壮大,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势力。吴郡的顾、陆、朱、张,会稽的孔、魏、虞、谢等强宗大姓,不仅“财丰巨万”,而且“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sup>①</sup>。但是,由于此时南方经济刚刚从低谷中走出,江东土著豪族地主的势力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还不能与北方宗法封建性大地主的力量相匹敌,因而江东土著豪族地主具有明显的软弱性特点。这种软弱性不仅存在于东吴时期,而且持续较长,至东晋时表现得尤为清楚。西晋灭亡后,江东的土著大族不仅没有乘势而起,拥戴自己的首领建立政权,反而容忍和支持以中原南渡的司马氏和北方大族为核心的东晋政权,便是一个极好的明证。

其次,江东土著豪族地主又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点。豪族地主作为宗法封建性大地所有者,历来带有地域性特点。《后汉书·酷吏传》序文中指出:“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不论是“陵横邦邑”,抑或是“雄张闾里”,实际上都指明被称为“豪猾之民”的豪族地主势力往往局限于某一地区的地域性特点。与享有政治特权的地主世家相比,豪族地主没有政治身分,他们主要凭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顽强的宗法势力,才能够独霸一方,称雄于乡里。江东土著豪族自然也不例外。然而,豪族地主的地域性特点,特别是其为扩展自己实力而直接组织和经营生产的历史主动性,却使他们成为东汉以来江东区域性经济的主要社会代表。一方面,他们在促进江东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主要的组织和经营作用,其积极的一面不应抹杀;另一方面,他们又主要着眼于江东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着眼于自身在江东地区的既得利益,趋向于拥众自保。虽然在东汉末年的军阀纷争中,江东土著豪族地主中的相当一部分与孙氏政权相结合,逐渐转化为“世有高位”的地主世家,但

其注重区域发展的特征依然存在,并且通过他们的政治代表强烈地表现出来。

江东土著豪族地主既是东吴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则其地域性和软弱性的特点必然要影响到东吴政权的政策。身为一国之主的孙权亦深知与江东大族保持一致的重要性,所谓“势一则禄祚可终,情乖则祸乱尘起”<sup>②</sup>。为了国祚久永,孙权在制订政策时就不得不考虑江东大族的利益与要求。一方面,孙权在用人上“外仗顾、陆、朱、张”<sup>③</sup>;另一方面,东吴政权的基本国策则体现了江东大族的利益及其地域性、软弱性的特点。江东大族的根基在江南,基本利益也在江南,他们要求孙权以保存地域利益为前提。不少江东大族地主反对主动出师北向攻魏,其实质就是反对把他们所拥有的有限的人力、物力消耗在北取中原的战争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孙权为“禄祚可终”而迎合江东大族的意愿,作出“保有江东”的战略决策,正是务实之举。

“保有江东”这一国策的提出,既是区域性经济发展和江东土著豪族地主的特点在东吴政权政策上的必然反映,而且反过来又维护和促进了江东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东吴政权创建伊始,即以“保有江东”为基本国策,这就使得它在三国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环境中,能以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江东的开发和经营,成为当时战事最少的一方,既在数十年时间里保障了江东的安定,又保存了江东的人力和物力,对江东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王夫之认为:“自汉末以来,数十年无屠掠之惨,抑无苛繁之政,生养休息,唯江东也独”<sup>④</sup>。这一评论虽不尽确切,但相对于同时期的魏、蜀而言,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综上所述,吴主孙权确立并恪守不渝的

① 《三国志》卷28《邓艾传》。

② 《三国志》卷46《孙策传》。

③ 《三国志》卷61《陆凯传》。

④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

“保有江东”的基本国策,不仅反映出他善于审时度势的战略家眼光,而且充分体现了他的务实精神。揆诸当时形势,是没有理由将其贬为苟且偷安、不图进取的。

## 二

从“保有江东”的既定国策出发,灵活地运用外交与军事手段,始终没有陷于两线作战的窘境,是孙权战争谋略的又一过人之处。

腹背受敌、两线作战,向为兵家之大忌。三国时期实力最强而且基本上统一了北方的曹操,在与蜀、吴的交争中,每每功亏一篑,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陷入了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窘境。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建安年间分别攻蜀与攻吴的两次战役。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四月,曹操率师进攻张鲁,至七月即迫使张鲁投降,夺取了汉中,蜀汉告急,“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sup>①</sup>,形势显然对曹军极为有利。但恰在此时,孙权率众十万围合肥,东线战情顿趋紧张。曹操唯恐东线有失,不敢乘胜直取巴、蜀,匆匆撤军东返。两年后的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又亲率大军东伐孙权,重兵围攻东吴濡须口。孰料刘备又“观衅伺隙”,遣部将张飞、马超等屯守,自率诸将进兵汉中。曹操西线告急,不得不撤濡须之围,西上击蜀。然而待曹军风尘仆仆赶到汉中,大将夏侯渊已被杀,汉中落入刘备之手。曹操兵力虽强,但东奔西扑,“适疲于西,又务于东”<sup>②</sup>,被迫两线作战,终至顾此失彼,处处被动,难有所获。曹军主力被迫两线作战的窘况,在三国鼎立的数十年中一直未能摆脱。

相比之下,孙权在力避两线作战这一点上的处境要比曹操好得多。纵观三国形势,看似魏、蜀、吴三足鼎立,实际上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在经济力、政治力和军事力上的对立与抗争。据有益州的蜀汉与控制荆、扬的东

吴之间虽然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毕竟同属于长江流域,都以黄河流域的曹魏为主要之敌,因而与蜀汉联盟共抗曹魏就成为东吴外交政策的基本点,此其一;其二,以刘备、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统治者囿于宗法正统观念,坚持“汉、贼不两立”的立场,决不与曹魏妥协,故蜀、魏双方始终处于交战状态。而孙权则充分利用魏、蜀两方势不两立、绝无联合之可能这一点,在坚持以吴蜀联盟为主的同时,又不拘泥于一格,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结成暂时的吴魏联盟,使东吴在数十年中从未陷于两线作战,从而较好地实现了“保有江东”的目标。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挟平定北方之余威,亲率大军南下,企图一举消灭刘备、孙权两支占据长江流域的势力,实现全国统一的目标。面对来自北方的共同敌人,孙、刘两家结成联盟,在赤壁一战中协同作战,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曹操。赤壁战后,曹操虽退回北方,但依然虎视眈眈地窥伺着长江流域,来自北方的严重威胁并未消除。孙权自然也不敢稍有疏忽,他听从鲁肃的建议,把荆州借给刘备,“与共拒曹操”<sup>③</sup>,借此加强了孙刘联盟。但荆州位居江东上流,扼东吴之肘腋,故孙权为保江东计,亦时时想索回荆州,以时机未成熟而不敢轻举妄动。鲁肃病卒后,接任的吕蒙以蜀汉镇守荆州的关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sup>④</sup>,力主攻取荆州以全据长江,深得孙权嘉许。但其时曹操方攻东吴濡须,后虽引军还,仍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于居巢,重兵压境,威胁着东吴。为免除两线作战的危险,防止曹操乘东吴与蜀汉争夺荆州之机侵袭江东,孙权在暗中部署、积极准备夺取荆州的同时,不惜“屈身忍辱”,派出使臣“诣操请降,操报使修

① 《资治通鉴》卷67。

② 《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页。

③ 《资治通鉴》卷66。

④ 《三国志》卷54《吕蒙传》。

好,誓重结婚”<sup>①</sup>,孙、曹之间的敌对形势得以缓和,从而为全力夺取荆州消除了后顾之忧。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自称汉中王;关羽也在荆州发动攻势,生擒曹军大将于禁,围曹仁于樊城,蜀、魏间的冲突明显加剧。孙权抓住时机,“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sup>②</sup>。对于孙权的用心,以议郎参曹仁军事的赵俨一针见血地指出:“权邀(徵)羽连兵之难,欲掩制其后,顾羽还救,恐我乘其两疲,故顺辞求效,乘衅因变以观利钝耳。”<sup>③</sup>而曹操虽知孙权用意,却想假手于东吴,“欲使两寇自敝,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sup>④</sup>。各怀鬼胎的孙、曹双方,在共同对付关羽这一点达成了暂时的默契,这与孙权主动“顺辞求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孙权此举,免除了腹背受敌之忧,从而保证了夺取荆州目标的顺利实现。

孙权从“保有江东”的基本国策出发,虽杀关羽、夺荆州,却并不想吴蜀彻底决裂而让曹魏得利。因为孙刘的矛盾在荆州,而吴魏的矛盾则在存亡。曹操有统一全国的力量和野心,蜀汉的“兴复汉室”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对于东吴而言,真正的威胁来自曹魏,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孙权制订军事外交策略的出发点。对于“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sup>⑤</sup>的天下形势,孙权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因而当他夺回荆州、刘备欲为关羽复仇而率师伐吴时,孙权立即遣使求和,并晓之以利害,然而刘备却“盛怒不许”<sup>⑥</sup>,执意进兵。孙权知吴、蜀间的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不得不转而展开了联魏外交。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八月,孙权遣使“卑辞奉章”,向曹魏称臣,并将曹魏大将于禁送还;接着,又不顾手下众大臣的反对,接受了魏文帝曹丕授予的吴王封号;当曹丕遣使至江东索取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翡翠等异物时,孙权又百般隐忍,尽力满足。孙权如此卑躬屈膝地奉迎曹丕,其意恰如刘晔所说,“一以却中国

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惑敌人”<sup>⑦</sup>。孙权的联魏外交虽出于无奈,所谓“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sup>⑧</sup>,但却在一段时间内缓和了北方曹魏对江东的威胁,特别是有效地防止了曹魏利用蜀汉大举伐吴之机渡江南下两面夹攻的危险,得以从容布署诸将,全力以赴地迎战刘备,取得了夷陵之战的胜利。

然而吴魏结盟对于孙权来说毕竟只是一种迫于形势而为之的权宜之计,随着吴、蜀间争夺荆州的斗争告一段落,以及刘备在夷陵败后对吴态度的变化,孙权即转而专注于与蜀汉连和。夷陵一战,东吴大获全胜,曹丕诏答孙权,要他“勉建方略,务全独克”<sup>⑨</sup>。然而孙权君臣却认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sup>⑩</sup>,不仅不乘胜追击,反而决计回师。同年九月,曹丕为控制东吴,命孙权送太子孙登入侍为质,孙权则“多设虚辞”,“辞让不受”<sup>⑪</sup>。曹丕大怒,发兵三路伐吴。孙权当即断绝了与曹魏的交往,遣使聘于蜀汉,蜀汉亦遣使回报,一度遭到破坏的吴蜀联盟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迅速得到修复,双方“戮力一心,同讨魏贼”<sup>⑫</sup>,迫使魏军无功而返。

在魏、蜀、吴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中,吴主孙权能比较清醒地分析和把握天下大势,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既坚持与蜀汉联盟为主的基本方针,又不拘泥于一格,一切视己方利益为转移。人或以为孙权狡狴、不守信义而反覆无常,其实这恰恰说明他善于分析形势,长于利用矛盾,始终避免两线作战,而使自己

①③④ 《资治通鉴》卷68。

② 《三国志》卷47《孙权传》。

⑤⑦ 《三国志》卷14《刘晔传》。

⑥ 《三国志》卷32《刘备传》。

⑧⑩ 《三国志》卷47《孙权传》。

⑨ 《三国志》卷47《孙权传》注引《魏书》。

⑪⑫ 《资治通鉴》卷69。

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以吴国之力,得以在三國中享祚最久,其中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孙权高超的战争策略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 三

因时、因地制宜,调动各种手段以实现既定目标,也是孙权战争谋略的一大特色。

孙权自公元200年接替其兄孙策,至公元252年病死,统治江东前后历五十二年。在此期间,东吴曾先后与黄祖、蜀汉、曹魏等交战,但威胁最大的主要之敌乃是曹魏。为了对付曹魏,防御曹魏对江东的袭扰和进攻,孙权在军事上采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应敌措施:

其一,凭借天险,沿江设防。浩瀚的长江,是横亘在东吴与曹魏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曹操、曹丕父子曾数次亲率军队用兵江东,均“临江而旋”。曹操“西至于赤壁,东至于濡须,临长江之浩荡而气夺”<sup>①</sup>;曹丕于公元224年和225年两次兴师伐吴,进至江北之广陵,临江观长江之波涛汹涌,一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sup>②</sup>,再叹“固天所以限南北也”<sup>③</sup>,不得不罢兵北还。长江确乎成了可以被孙权用来“保有江东”的天险。但是,东吴之所以能安居江东,并不仅仅是由于长江天险的屏障。东吴将领贺邵就曾指出:“长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苇可航也”。他认为,孙权之所以“创基南夏,割据江山,拓土万里,虽承天赞,实由人力也”。<sup>④</sup>事实确是如此。孙权在充分利用长江天险这一有利因素以对抗曹魏的同时,或筑堡建垒,或选将陈兵,十分重视沿江防务。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九月,吕蒙闻曹操欲出兵东击孙吴,即建议孙权立坞于历阳(今安徽和县)西南的濡须水口。时诸将皆不以为然,以为“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吕蒙却坚持认为:“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

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sup>⑤</sup>面对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孙权坚决支持吕蒙的主张,遂夹濡须水口立坞,且在坞中“备御甚精”。后来的事实证明,濡须坞在东吴抵御曹魏进攻的过程中起到了桥头堡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曹魏的攻势。及至孙权晚年,犹不忘利用地形、水势以加强防守。公元250年,即孙权病逝的前两年,“吴主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以绝魏兵之窥建业”,“为自保之规摹”<sup>⑥</sup>。

不仅如此,孙权在沿江险要之处均注意加强防守。史载:“吴保江南,凡边要之地皆置督”<sup>⑦</sup>,即遴选得力将领为都督,分别镇守沿江各处。如“忠而勤强,有胆略器用”<sup>⑧</sup>的徐盛镇芜湖;“战如熊虎,不惜躯命”<sup>⑨</sup>的周泰督濡须;东吴的杰出将领吕蒙、陆逊相继镇陆口,陆逊后更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辅佐太子戍守武昌;步骘都督夷陵,等等。东吴的一大批精兵强将把守沿江各军事重镇,“舟船器仗军伍整肃”<sup>⑩</sup>,严阵以待。在这样的情况下,曹魏“屡起锐师,临江而旋”<sup>⑪</sup>,自然是并不足怪的。

其二,设诈用奇,诱敌入彀。古往今来,善用兵者都很重视“谋攻”,所谓“兵无谋不战”<sup>⑫</sup>。而欺敌用诈的诡道之术,也属于军事谋略的一种。《兵经》曰:“克敌之要,非徒以力制,乃以术误之也”<sup>⑬</sup>,说的就是要用各种方法(包括制造假象)以造成敌人的失误,制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9。

②③④ 《资治通鉴》卷70。

⑤ 《三国志》卷65《贺邵传》。

⑥ 《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吴录》。

⑦ 《资治通鉴》卷75。

⑧ 《资治通鉴》卷71。

⑨⑩ 《资治通鉴》卷68。

⑪ 《资治通鉴》卷66。

⑫ 参见《兵经释评》,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⑬ 《兵经释评》第44页。

敌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吴主孙权是颇通此道的。他在与曹魏的对抗中曾数次设诈用奇,诱敌入彀。黄武七年(公元228年)五月,孙权“使鄱阳太守周鲂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方所闻知者,令谯挑扬州牧曹休。鲂曰:‘民帅小丑,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亲人资笈以诱休,言被谴惧诛,欲以郡降北,求兵应接。’吴王许之。”<sup>①</sup>曹休果然中计,“率步骑十万向皖以应鲂”。孙权以陆逊为大都督,以朱桓、全琮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迎击。此役东吴以逸待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军资器械略尽”<sup>②</sup>,使曹魏遭受一次颇为沉重的打击。黄龙三年(公元231年)十月,孙权故伎重施,又命中郎将孙布“诈降以诱扬州刺史王凌,吴主伏兵于阜陵以俟之”<sup>③</sup>。虽然曹魏已有前次失误的教训,征东将军满宠认为其中必定有诈,不同意发兵,但王凌依然信以为真,在“索兵不得”的情况下,仍“单遣一督将步骑七百人往迎之”。孙布乘夜掩袭,魏军死伤过半,东吴又获小胜。孙权“时于疆场之间,设诈用奇,以诱敌人之来而陷之”<sup>④</sup>,既杀伤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减缓对自己的压力,又可挫曹魏军队的锐气,使其不敢轻易来犯,不失为在与曹魏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打击敌人、保存自己的一种有效手段。

其三,以攻为守,主动出击。“保有江东”的基本国策,决定了东吴以守为主的战略方针。但这并不意味着东吴仅是一味地单纯防守。孙权的高明之处在于既以主要精力用于防御,又不失时机地主动出击,做到了守中有攻,攻防结合。而无论是攻还是守,又都注意有利有节,始终不离“保有江东”这一基本国策。在孙权统治江东的五十余年中,吴、魏之间先后交战十七次,其中曹魏主动进攻的五次,另有前述孙权命部将诈降而诱发的两次,而东吴主动出击的却有十次之多。乍看起来,这一统计数字似乎与东吴“保有江东”的国策并不合拍,其实,只要对东吴主动出击的作战

时机和进攻方向略作分析,便可明白两者之间并无矛盾。

孙权主动攻魏的十次军事行动,大体上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与蜀汉相配合,从东、西两线夹击曹魏。如公元208年,孙刘联军在赤壁与曹军大战,孙权乘势在东线围攻合肥;公元215年,曹操西入汉中,进逼巴蜀,孙权又进攻合肥。二是利用曹魏政权内部的变故,伺隙发动攻势。如公元226年,孙权闻魏文帝曹丕死,即率军攻江夏、襄阳;公元241年又乘魏明帝新亡、幼童莅事之机,发兵四路攻魏。三是为加强江东的防务,与曹魏争夺长江以北的战略要地,如合肥、庐江、皖城等。

再从进攻的方向看,孙权主动攻魏的矛头所指,主要是长江以北的合肥、庐江、皖城等地,从未深入到曹魏控制的中心区域。在东吴的十次攻魏战争中,一次为攻取皖城,一次为争夺庐江,一次攻江夏、襄阳,五次专攻合肥,公元234年三路攻魏,是向北深入较多的一次,最远也只到淮阴。由此不难看出,孙权的主动出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并非真想与曹魏争夺中原。但是这种以攻为守的军事行动,对于稳固江东的防守还是起了作用的。试以公元214年东吴攻皖城一役为例。初,曹操“恐滨江郡县为孙权所掠,欲徙令近内”,结果反而使“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形成了“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sup>⑤</sup>的局面。尽管如此,但由于曹魏庐江太守朱光驻屯皖城,垦屯积谷,仍对东吴构成不小的威胁。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吕蒙建议出兵攻取皖城。孙权深表赞同,亲率大军出击,一举攻破皖城,获朱光及男女数万口,拔除了这颗钉子。至于合肥,曾为曹操所置扬州刺史的治所,又是曹魏驻扎重兵、南

(下转第55页)

①② 《资治通鉴》卷71。

③④ 《资治通鉴》卷72。

⑤ 《资治通鉴》卷68。

揭示人类存在的普遍秘密,因此它的人物形象更多地具有象征性(或者如常说的抽象性),而不是典型性。过去对人物塑造的成败至关重要的个性描写,越来越被夸张的、荒诞的、漫画式的表现所代替。家庭、职业、财产、等级地位等等,总之,一切外在的社会学标志,也都失去了昔日的重要意义,而只成为内在于人性的一件可以更换的外衣。在美国荒诞派剧作家阿尔比的剧作《动物园的故事》里,长凳上的两个人正是作为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游客”跟另一个“游客”相遇的。卡夫卡的人物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只用字母代替。

这里顺便要指出的一点是:现代主义的“表现自我”与19世纪浪漫主义的“表现自我”有本质区别,而这种区别常被忽视。浪漫主义强调的是“作者自我”,因此作者本人常出现在作品中代替主人公,或使主人公成为作者的化身。而现代主义强调表现的是“人物自我”,由于它重视小说的视角,因此不会允许作者本人的自我随意破坏作品的艺术结构。

概言之,典型是古典概念,自我是现代概念。人们常用“反典型”来概括现代主义的人物形象,其实,现代主义的人物形象虽然“反”

典型,却也并非中世纪或古典主义的类型,称之为“超典型”也许更恰当些。与传统典型相比,它对人性的开掘更深更广,表达了对人性的新理解:人是活的,生命的秘密是无限的,不能用类似 $1+1=2$ 的机械公式来限定他。

在其他方面,与传统文学相比,现代主义体裁与风格的丰富性和解放性、时空结构的多维性以及深层心理分析等等,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在此不再赘述。

“反传统”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实际上现代主义本身就是文学传统的产物,与文学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也就不会有现代主义。只是关键问题在于,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突破了哪些旧传统,为文学史增添了什么新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根据以上粗略的叙述,我们觉得可以说,尽管有种种失败的例子,现代主义毕竟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一次文学革命。当然,正象爱因斯坦相对论突破了牛顿的经典力学但并非绝对否定它一样,现代主义也只突破了传统文学的旧体系而非绝对否定它。文学同样需要多元化,有的传统方法如批判现实主义尽管今日已不再领导世界文学潮流,但仍然可以存在,甚至直到人类末日。

~~~~~

(上接第68页)

下攻吴的战略据点。孙权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兵攻打合肥,显然也是出于“保有江东”的考虑。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孙权审时度势所确立的“保有江东”的基本国策及其在军事行动中表现出的高超的战争策略,才使得东吴“乘

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得以“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sup>①</sup>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对于东吴“保有江东”的基本国策以及孙权为实现这一国策而表现出的战争谋略,应该给予必要的肯定。

<sup>①</sup> 《三国志》卷47《孙权传》。